

中德文化交流溯源

周岩厦

(浙江科技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系,浙江 杭州 310023)

摘 要: 中德文化交流自《马可·波罗游记》来,至今已历经五百余年,前后经历了由莱布尼茨掀起的“中国热”,德国传教士及学者进行的德意志文化东传,中国学者及留学生的主动参与西学传播,中德学会的文化传播纽带及新中国的中德文化双向交流。两国间文化交流久盛不衰,其根本原因是德国人民对中华文化久远的由衷钦佩,以及中国人民对德意志民族的彻底性一向推崇。同时,两国文化的差异性也是相互交流的必要基础,为互相学习、借鉴提供了动力。

关键词: 中国热; 莱布尼茨; 西学东渐; 汤若望; 中德学会; 留德学生

中图分类号: G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798(2004)02-0120-05

中德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自《马可·波罗游记》在德国出版后,历经“东学西被”在德国掀起的“中国热”,“西学东渐”中的德意志文化远播中国,及20世纪前期建立的中德学会所倡导的双向文化传播,乃至当今活跃的官方、民间文化交流。前后历经五百余年历史。

1 “东学西被”下的“中国热”

早在13世纪就有德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在当时德国的文学及一些文献中,已有对中国的描述。1477年,《马可·波罗游记》在德国出版,中国第一次展现在德国人民面前。最早接近中国的德国人,是出生在科隆城的庞倍尔。德国的“中国热”,则是由德国的著名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tz, 1646—1716)率先掀起。

1.1 莱布尼茨笔下的“中国”

莱布尼茨是17、18世纪之交德国最重要的哲学家、数学家。他学贯中西,对中国文化及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莱氏很早就接触到来华传教士及其他学者所写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和报道。1689年,他结识了耶稣会来华传教士闵明我(Grimaldi C F),了解到了有关当时中国的第一手资料。1691年5月和1692年3月,莱氏先后两次致函闵明我,讨论中西文化交流问题。他在1692年3月的信中写道:“相隔遥远的民族,相互之间应建立一种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其他的民族无权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中国人。”“他们善于观察,而我们长于思考。交流我们各自的才能,共同点燃我们的智慧之灯!”^[1]莱氏在信中建议有必要借鉴中国的化学、医学以及天文学方面的技能。他甚至建议“可以把那些既擅长讲授语言又善于传授事物的人也一起带来。这样,我们便可以通晓汉语,并且有可能从我们拥有的、但至今未得到利用的汉文书籍中汲取有用的东西。”^[1]莱氏不仅显示出了不带“欧洲中心论”色彩的虚心好学精神,而且为中西文化双向交流描绘出了一幅宏伟的蓝图,致力于推动交流向纵深处发展。

在与闵明我保持通信联系的同时,莱氏还与多名来华传教士,如白晋(Bouvet J)、洪若翰(Fontanay J de)、杜德美(Jartoux J B)、刘应(Visdelou C de)等以及在欧洲的汉学家台韦居斯、戈比安、科康斯基等互通书信,如饥似渴地了解 and 探讨有关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的问题。据统计,莱氏一生所写的书信中,有200多封

收稿日期: 2003-07-01

作者简介: 周岩厦(1964—),男,浙江仙居人,讲师,在职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语教学与中西文化研究。

论及中国^[1]。

1697年,莱氏主编出版了《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一书。他在序言中写道:“大概是天意要使得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携起手来,逐渐地使位于它们两者之间的各个民族都过上一种更为合乎理性的生活。”他强调中、欧各有长处,有必要互相学习借鉴。面对欧洲战乱频仍,道德沦丧,他甚至提议:“鉴于我们道德急剧衰败的现实,我认为,由中国派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的运用与实践,就像我们派传教士去教他们开启神学那样,是很有必要的。”^[1]

1.2 德国哲学家与中国儒家思想

在中国哲学思想方面,对西方影响最大的当属孔子与儒家思想。在德国,古典哲学家们从孔子和儒家思想中吸收了辩证法思想。莱布尼茨是受中国哲学思想影响最大的德国哲学家,他从中国哲学中吸收了朴素辩证法因素。继莱氏之后的是沃尔夫(Christian Wolff, 1679—1754),他用德语在德国大学中宣讲孔子思想。1721年,他在哈尔大学讲演《中国的实践哲学》,对欧洲学者了解孔子哲学起了很大作用。因为这次演讲,他被学校驱逐。其后是舒尔兹和康德。德国哲学革命自康德开始,中期经有费希特和谢林,在哲学领域中掀起一场反宗教神学,推崇理性的革命,最后形成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我们虽然很难说这场革命与中国哲学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每个德国哲学家都曾认真研究过中国及中国哲学,这是毫无疑问的。在康德的《永远平和论》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都有关于中国的论述,他们都研究过孔子及儒家思想。

1.3 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量西传

近代西方人从《马可·波罗游记》中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而正式把中国文化传播往近代西方的是一些前来中国的传教士,在18世纪形成第一次热潮。1626年,法国人金尼阁(Tyigault N)把五经译成拉丁文。后有宋君容(Gaubil A)、马若瑟翻译了《诗经》、《书经》等。中国古典小说、戏剧和寓言也开始进入欧洲。马若瑟翻译了《赵氏孤儿》。该剧先后在英国、德国、俄国翻译出版。1781年,德国诗人歌德通过杜赫德(DU Halde J B)的德译本,了解到《赵氏孤儿》和《今古奇观》中的4篇短篇小说及《诗经》中的一些诗作。同年,他尝试将《赵氏孤儿》改为悲剧《哀兰伯诺》。1827年,他阅读了《好逑传》并得出了“世界文学时代已快到来”的结论。他还受到清代小说《花笺记》、《玉娇梨》的启发,创作了著名的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

19世纪60至70年代,“东学西被”进入第二个高潮,中德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861年普鲁士遣使来华签约,为中德官方关系的开端,在德国再次掀起了研究中国的热潮。学者对“中国学”的研究较莱布尼茨时代更为深入,也更为理性,形成了科学的“中国学”或“汉学”。嘎伯冷茨(Georg von der Gablentz)是一位卓有成效的汉学家,其最重要的著作是1881年出版的《汉文经纬》(Chinesische Grammatik),当属这一时期最优秀的汉语语法之列,表现出对汉语相当深入的认识水平,反映了欧洲中文研究的长足进步。自他之后,相继涌现了如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福兰阁(Otto Franke)、佛尔克(Alfred Forke)、柴赫(Erwin von Zach)等知名汉学家。卫礼贤精于经学子学,先后译有四书、易经、庄子、吕氏春秋、列子、道德经、礼记等书,他于1897年来华,对中国高度发达的古代文化深表敬佩,最终为中国文化所征服,并取名“希圣”,在青岛创办礼贤书院,主要研究中国的儒家学说。回国后,讲授中国古典哲学。福兰阁对史学有深入的研究,著有三大卷《中国通史》;佛尔克专于哲学,著有三卷《中国哲学史》;柴赫在训诂与文学方面造诣很深,译有昭明文选、李太白全集、杜甫全集、韩愈全集、陶渊明全集等。以上四人,各成一家,被誉为德国的“四库全书”。

进入20世纪,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的是德国大戏剧家和诗人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布莱希特热爱中国文化,其思想受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尤其是老子、墨子和孔子的影响。他的经典剧作,如《四川好人》假借中国四川为背景,《高加索灰阑》其情节也改编自一个中国古典戏剧。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核心“间离效果”一方面受到中国京剧表演艺术的启发,另一方面又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学院派戏剧理论影响深刻。

2 “西学东渐”中的德意志文化东传

德国文化对中国也产生了深入而持久的影响。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同时,也将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技术带到了中国。在这些传教士中,最著名的要数德国耶稣教士汤若望,通过他和其他传教士的努力,西方的天

文学和地理学得以在中国传播。其中以天文、历算之学对中国影响最大,它直接导致了我国历法史上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大改革——废除大统历,颁布时宪历。进入19世纪后,德国的近代科技进一步传入中国。20世纪前期,教育、文化的传入尤为突出。

2.1 汤若望、戴进贤与中国天文学

1592年5月1日,汤若望出生在今德国科隆,名为Johann Adam Schell von Bell。1619年抵华,取名汤若望,1623年初,晋京开始测算日食和月食。1626年,他著《远镜图说》,介绍望远镜的制法及其原理,率先将西方光学传入中国。1630年,他奉召进历法局任职,与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等共同完成了《崇祯历书》共137卷。明清交替之际,汤氏进献《崇祯历书》、望远镜、日晷、地图,及时地迎合了新朝的需求。《崇祯历书》为顺治帝改名为《时宪历》,颁行天下,并授汤氏为钦天监监正,开启了传教士供职钦天监的先例。入清后,汤氏将《崇祯历书》缩编为100卷,加上他本人撰写的《筹算》、《历法西传》、《新法历引》,共103卷,命名为《西洋新法历书》进呈清廷。汤氏还与李天经共同翻译了德人格奥尔格·鲍尔的冶矿专著《坤舆格致》。他还参与绘制了《见界总星图》,突破了中国古代制图的传统方式,在恒星测量推算、星图的形制和表绘上,都有创新,从而奠定了近代中国星图的基础,被誉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出星图。”^[1]

戴进贤(Koegler I)是钦天监的又一位德籍监正,1716年秋抵华,取名戴进贤,翌年抵京与中外儒士一起从事推算,1720年成为钦天监主要负责人,1725年被正式补授为钦天监监正。1731年,雍正皇帝敕命他为礼部侍郎,为当朝二品。戴进贤在天文历算方面的工作扎实而卓有成效。1723年,他绘制了《黄道总星图》并为之著文说明。之后,他又编纂了《历象考成后编》和《仪象考成》。1742年主持编纂了新的《历象考成》。此历书自颁行后一直使用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戴氏还与另一德籍传教士刘松龄(Hallerstein A de)一起对南怀仁(Verbiest F)等所编的《灵台仪象志》进行了重新测量校正。书成后,乾隆帝赐名“仪象考成”。对于戴进贤当时在中国的天文历算工作,历史文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如清朝文献《通考》曾作如下评述:“皇上增定后编,重制仪象,凡古法之失传与西法之积岁参差者,随时厘正。所以揆天察纪,明时正度,俾象纬昭然,耳目至纤至悉。”^[2]对戴氏的成就,方豪先生曾评述道:“在介绍西洋天文学说方面,南怀仁亦不如戴进贤。”^[3]

2.2 19世纪后德国科技、教育、文化输入中国

19世纪后期,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开始输入中国。相继来华的德国学者、科学家、汉学家、传教士及教师不少。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地貌学家李希霍芬男爵(Ferdinand Richthofen, 1833—1905),在中国内地先后作了7次考察旅行,对中国和亚洲地区的地质、地貌特征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并提出中国黄土风成的假设。1888年来华的汉学家福兰阁,于1909年在青岛创办第一所德华高等学校“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他坚持尊重中国传统优良文化的方针,要求学生注重中文的培养与进修,极力主张由中国人出任学堂“总稽察”(校长)^[4]。1913年,该校设有4个系:法学-社会学系、自然科学系、农林经济系和医学系。

1923年,西门子中国公司经理勃吕歇尔博士发起并成立了“德国工程师中国协会”,以促进现代科学技术的交流。德国在华的学校也在战后再度开办。其中同济大学对中国教育最具影响力。同济大学的前身为同济德文医学校,1907年由德国人所建,获德国工商金融界资助。大战期间由中国接收,1927年正式命名为国立同济大学,它是培育亲德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和学者的主要渠道。

在德国文化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政治和哲学。1920年,陈望道率先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一些著名的德国哲学著作,如康德、黑格尔的作品也被译成中文。德国文学名著如《格林童话》,歌德、席勒、海涅等人的作品也先后被介绍到中国。郭沫若所译的《浮士德》、《少年维特的烦恼》以及有多种译本的《茵梦湖》,在中国反封建、反旧礼教的斗争中都起过重要的作用。

除了德国古典哲学外,德国现代哲学也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叔本华的哲学对中国著名文学家王国维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尼采的哲学对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鲁迅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3 中国学者肩负起东传德国文化的重任

清政府对“西学东渐”的反应,首先是在186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外语学校“同文馆”,以培养翻译人员,其次是派遣赴欧考察团和留学生。

3.1 赴欧游记:《乘槎笔记》、《航海述奇》

1866年,清政府派出第一个由斌椿率领的同文馆学生赴欧洲游历考察团。斌椿等人是第一批亲身接触和了解欧洲文化的中国代表,他们在德国等西欧国家第一次见到了火车、电报、纺织机、抽水机、高层建筑等“工业文明”和日耳曼文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斌椿的《乘槎笔记》和张德彝的《航海述奇》,是中国人最早了解西方和德国的直接记录。张德彝此后8次出国,每次都留下一部以《述奇》为名的日记体裁的见闻录,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3.2 留学德国

从1870年起,清政府开始选派学生留学德国,主要学习德国的“船坚炮利”的军工技术。1904年,中国废除科举制度,自此才对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精神科学和政治、社会思想真正开放。此后,德国在华学校中的学生和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为寻求救国之道,自费留学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德文化交流中断。战后,中国学生留学德国人数激增。根据1921年《中德协议》的附加换文,德国政府同意提供奖学金,接受中国学生进入德国高等学校或为中国学生提供实习场所^[5]。在战后德国通货膨胀时期,中国学生留德人数还是不少。1924年,仅柏林一地就有近1000人。1925年,中国留德学生数为232人,1926年为214人,1927至1928年为174人,1928至1929年欧洲经济危机时期,降到153人,此后又上升。

中国留学生主攻专业分别为技术科学、自然科学、医学、化学、国民经济学和哲学。他们中后来不少人成为中国著名人物。蔡元培为其中之一,曾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总长,坚持洪堡式的教育观点和教育改革,主张对新旧思想“兼容并包”。还有一批政治家曾到德国留学、游学或寻求救国之道。

4 双向文化交流的纽带——中德学会(Deutschland-Institut)

4.1 中德学会立会宗旨与学会组成人员

1933年,中国学者郑寿麟首先发起并成立了中德学会。成立大会上,学会明确了成立的目的:“沟通中德两国之文化与学术,促进两国人士对两国固有文化与学术的相互认识”;确定了创办的宗旨:“纯以研究中德两国之学术,沟通两国之文化,增进两国学术之合作,促进两国人士对两国固有文化与学术的彼此深刻了解”;规定了任务:①为热心于中德文化研究的两国学术文化界人士提供种种方便条件,促进研究的深入;②成为两国志趣相同的学术文化界人士的联络中心。大会所推举的董事,都是当时中国学术界、教育界的泰斗和外交界的耆宿,大多是留德学者或同德国有着深厚渊源关系者,如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共21人。学会还特邀陶德曼大使和教育部长王世杰为名誉会长,以便于争取中德两国政府和官方名流的支持^[6]。

4.2 中德学会取得的成就

中德学会成立后先后开展了有关中德文化交流、留德、旅德等方面的咨询活动,为中德双方的图书馆、学校和各种文化机构建立联系,代购中、德文书籍,介绍会员协助北京大学翻译、印行书籍刊物,并约人撰写“中德文化丛书”,还在北京、南京、上海、杭州等地举办德国现代印刷展和在北京举行席勒纪念会,以便中国人加深对德国文化的认识。

1935年是中德学会成绩斐然的一年:①成立了咨询处,为留德旅德学者及对德国文化、教育、学术有兴趣者提供各种帮助及方便,并编译了《德国留学指南》;②与德国学术交流中心、柏林德国国外书籍交换处、慕尼黑德意志科学院等建立了联系,并代理其在华业务,把它们的各种学术杂志书报赠与中国读者;③为中国学者介绍和申请洪堡研究奖学金;④创办德语补习夜校;⑤充实“中德文化丛书”的选题,大力推进丛书的编译和出版,及编写德语教材并创编《中德学会特刊》。

“七七事变”后,学会的绝大部分董事和负责人以及不少会员南下抗战后方,但同时该学会因为是由德国人为主的纯学术机构,未受到日本占领军的干扰,工作照常进行。汪伪政权期间,中德学会一直奉行“纯以研究中德两国之学术,沟通两国之文化”的宗旨,不为驻北京的德国纳粹机构服务。1945年春,时任德籍常务干事的傅吾康博士建议,德籍职员和会员全体退出中德学会,职务完全交给中国籍同仁,便于他们保护学会的图书及文物的完整,免受德国战败后的影响。中德学会至此退出历史舞台。

中德学会有德文藏书2871种,4450册;德国学术著作中文译著1000册;德文杂志72种,中文杂志20

余种;德国重要报纸数种,其中普鲁士科学研究院的《学术集刊》及哲学、历史学的专刊,自1900年至1941年共有99册,极具价值;还有1940年出版的《德文图书分类目录》和《中文期刊有关德国论文索引》等。这些藏书和资料,在二战结束前夕完整无缺地移交给了国立北平图书馆,1949年后,又全部转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由于保管不善,藏书和资料缺损不少。

5 新中国与德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中国于1972年建交。自从1975年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首次访华以来,两国领导人保持了密切的联系,高层互访不断,两国的议会和政府各部门之间也都建立了对口卓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80年代初期开始,两国关系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发展尤为突出。

5.1 经济合作

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增长近90倍,1972年为2.74亿美元,2001年达到235亿美元,占中国对欧盟贸易额的30%,超过中国与英国和法国两国贸易额的总和。至2002年,在中国的贸易进口中,德国排在第五位;而在中国的出口中,德国名列第四。德国是中国引进技术最多的国家之一。截至2001年底,中国批准从德国引进技术合同5421个,合同金额238.5亿美元,占技术引进合同项目总额的16.4%,仅次于中国从美国引进技术的金额。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德国对华直接投资不断发展。截至2001年底,德在华投资项目2701个,协议金额134亿美元,实际投入70亿美元,在欧洲国家中位居第一。大众、西门子、巴斯夫、拜耳为代表的1600多家德国公司在中国建立了独资和合资企业。在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中,德国以规模大、技术含量高、生产性项目多而具有突出的地位^[7]。在贸易促进方面,1999年2月在北京开设了“德国工商中心”。2000年6月在柏林签署了新的经济、工业与技术合作协定。设在法兰克福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CCPIT)、汉堡的联合贸易中心及科隆/杜塞尔多夫的德中经济协会不断推进了两国间的经济合作。

5.2 文化交流

中德文化关系的基础是1979年的双边文化协定以及在此基础上议定的文化交流项目。近几年,官方文化交流项目以外的合作也在逐渐增多。1993年,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在北京建立了办事处。1999年,中德签署了“相互承认高等学校学历的声明”。2000年10月在北京建立了“中德科学促进中心”。2001年9月的“亚太周”活动中,中国成功地在德国举办了“中国周”,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在国外举办的规模最大的文化活动。在欧洲,德国一直是中国留学生和学者的首选国家。至2002年,总计3万余人在德留学^[7]。近几年来,汉学在德国得到广泛关注,已有许多大学设立了中国文学等汉学相关专业。

6 结 语

两国间文化交流长久不衰,最根本的原因是德国人民对中华文化历史久远的由衷钦佩,及中国人民对德意志民族的彻底性一向推崇。同时,两国文化的差异性也是相互交流的必要基础,为互相学习、借鉴提供了动力。

参考文献:

- [1] 许明龙. 中西文化交流先驱[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3. 107, 192—194
- [2] 清朝文献通考[M]. 第4848卷.
- [3] 方 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75.
- [4] Franke O. Die deutsch-chinesische Hochschule in Tsingtau, ihre Vorgeschichte, ihre Einrichtung und ihre Aufgaben [M]. Hamburger: Ostasiatische Neubildungen, 1911. 200, 205.
- [5] 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卷)[M]. 北京: 三联书店, 1959. 168.
- [6] 黄时鉴. 东西交流论谭[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274—275.
- [7] 江建国. 三十而立——中德建交30周年硕果综述[EB/OL].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9/20021011/839879.html>, 2002—10—11.

(下转第128页)

(上接第 124 页)

Retrospect of China-German cultural intercourse

ZHOU Yan-xia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China-German cultural intercourse has experienced more than 500 years since Marco Polo visited China. It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sessions of events; 'Enthusiasm for China' led by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tz, the eastward introduction of the German culture by the missionaries and scholars; the participation of Chinese scholars and students in Germany in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mutual cultural intercourse by 'Deutschland-Institut' and the official & nongovernmental communication by the two countries since 1949. The essential cause of the long-term mutual communication of culture is the sincere admiration for the profound Chinese culture by the German people and the great esteem for the thoroughness of the German nation by the Chinese. Meanwhile, the difference of culture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has provided the necessary basis for the mutual communication, learning and appreciation.

Key words: enthusiasm for China;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tz; the eastward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culture; Johann Adam Schell von Bell; 'Deutschland-institut'; overseas students in Germany